

抗日烽火中的濠江兒女

黃鴻釗*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東北，激起全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浪潮；1935年12月爆發了著名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從此抗日救亡運動席捲全國。在全國抗日怒潮的推動下，澳門許多愛國青年也紛紛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中去。1937年7月7日發生北京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抗日救亡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澳門許多分散的小社團逐步組成統一的愛國力量。由於葡萄牙當局標榜“中立”，不許澳門愛國社團公開使用“抗日”、“抗敵”、“救國”一類字眼。因此，澳門愛國者祇好用“救災”作為“抗日救亡”的代名詞，以利開展工作。

先後由工商界組建“澳門各界救災會”；由國民黨澳門支部組建“澳門各界抗敵後援會”（由於該會在澳門對面的灣仔建立，不在澳葡管轄範圍之內，故照舊使用了“抗敵”字眼）；以及由澳門《朝陽日報》、《大眾報》聯合發起組建了“澳門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簡稱“澳門四界救災會”）。其中，澳門四界救災會基本上匯集了澳門當年各方面的青年愛國力量，是團結澳門各階層的抗日救國團體。《朝陽日報》社長陳少偉被推舉出任救災會理事會主席。理事會下設五個部和二十三個股，各部股的主任集中了30年代澳門各界的精英，如粵劇名家陳卓瑩、任劍輝，著名鉅商崔諾枝及其長女崔瑞琛，《大眾報》社長陳天心等，堪稱一時俊彥。救災會還聘請了二十八名知名人士為顧問，其中有：著名醫生共產黨人柯麟，澳葡政府華籍官員徐佩之、何仲恭，葡籍官員施基喇，中山縣縣長楊子毅，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梁彥明，商會主席徐偉卿等。

四界救災會成立後，立即以巨大的愛國熱情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去。從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主要從事抗日籌募、宣傳、動員和慰勞工作。首先，四界救災會採取多種形式開展籌募活

動，包括售旗、售花、售紀念章、義賣、義唱、義舞、酒店義租、擦鞋童義擦、人力車夫義拉、街頭和沿門勸捐、獻金運動、捐輸運動、學生中的“一仙”救國運動、遊藝會、水藝會、女伶演唱、粵劇義演、話劇義演、各類球賽及埠際體育比賽等等。籌募活動不斷深入發展，遍及澳門各個階層，其動員群眾的廣泛、影響之深遠，在澳門可說是史無前例的。1937年9月至11月間，四界救災會親自組織了五期籌款活動，一共籌集款項五千圓，交給澳門廣東銀行轉匯內地政府，作抗戰賑災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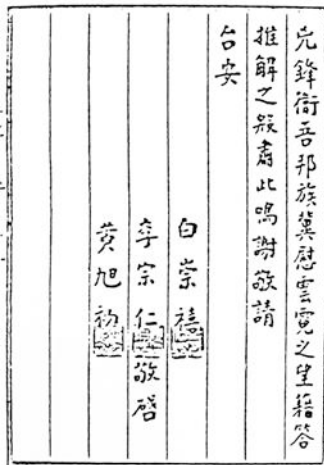
1938年7月初，四界救災會發動“七·七紀念捐輸運動”，並通函各界於當日舉行素食一天，以悼念前方陣亡將士和死難同胞。這個倡議得到了澳門各界人士的熱烈響應。7月7日當天，澳門飲食行業舉行素食籌募，酒家茶樓不售賣葷腥食品，祇供應素菜、羅漢齋、素包，包上並印有“毋忘七七”四個字。當年8月紀念“八·一三”一週年期間，四界救災會響應漢口發起的“獻金運動”，組織五個隊沿門派送“獻金封筒”，挨家逐戶去串門，深入宣傳發動，取得良好成績。獻金運動結束後，又發動了一次義賣運動，先後響

*黃鴻釗，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澳門史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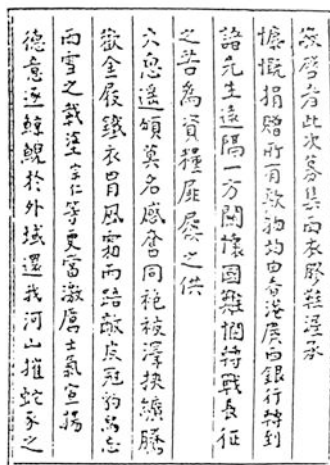
澳門回國服務團團長廖錦濤

第五路軍總司令部用牋



五路軍總司令李宗仁、白崇禧表彰澳門同胞

第五路軍總司令部用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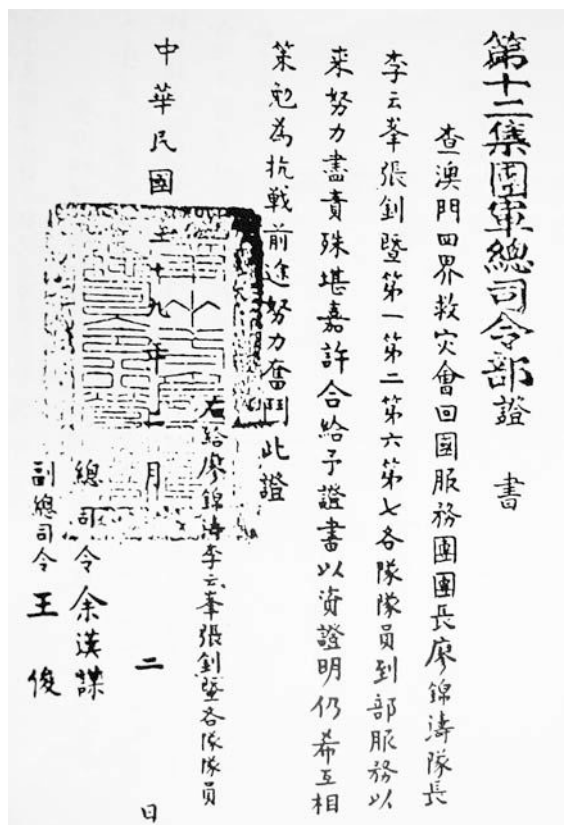


應加入義賣的商舖一百多家，為期四十天的義賣，共籌款國幣九萬餘圓，是歷次籌款運動中時間最長、成績最好的一次。

四界救災會在開展籌募工作的同時，積極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和慰勞抗日將士的工作。

1937年8、9月間，該會派出宣傳隊，到中山五區前山、白石、香洲、吉大宣傳抗日，隊員們張貼標語、壁報、漫畫，演出街頭劇、歌舞等節目，深受當地居民和駐軍歡迎。與此同時，澳門《朝陽日報》、《新聲日報》、《大眾報》還不定期出版抗日救亡特刊，宣傳抗日形勢。1938年5月6日，盤踞橫琴島的日軍派出一百餘人，分乘三艘橡皮艇攻打中山洪灣，被我守軍擊退。四界救災會立即組織慰勞團，前往洪灣向駐軍熱情贈送慰勞品和錦旗，表示敬意。同年8月，四界救災會又響應武漢發起的徵集慰勞信運動，發動澳門各界人士踴躍寫信慰問前綫將士。一時間，上自七十多歲高齡的老太太，下至年僅九歲的小學生，都紛紛拿起筆來，向英勇殺敵的抗日將士致敬，很快就收集到慰問信一千多封。

1938年底，抗戰形勢日見惡劣。10月間，廣州淪陷；12月底，賣國賊汪精衛在香港發通電向日寇求和。在此國難深重時刻，澳門四界



第十二集團軍表彰澳門回國服務團



20世紀40年代的澳門半島

救災會表現了鮮明的愛國立場，於次年1月9日，向重慶國民政府發出快郵代電，聲討汪精衛，擁護政府開除汪精衛黨籍和行政職務，堅持抗戰到底。代電說：“願我將士同胞，本此意志，一心一德，誓死擁護，為政府之後盾，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各黨各派之合作，益臻鞏固，務令暴敵漢奸，無所施其毒辣伎倆，則最後勝利，必屬我矣。”⁽¹⁾與此同時，於1938年10月21日，正式成立“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服務團在半年之內，先後派出十一個隊共一百六十多名男女青年分赴廣東的西江、東江、北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接受中共廣東黨組織的領導，積極參加抗日救國的艱苦工作。其中，第一隊十四人和第二隊十五人，在團長廖錦濤率領下，於1938年11-12月間，分別在西江高明縣、開平縣和鶴山縣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後來被派到第十二集團軍擔任軍隊政治工作；其後，第三隊十五人奔赴東江遊擊區東莞、寶安一帶工作；第四、五隊二十一人到順德縣淪陷區，與遊擊隊一起在龍眼鄉和西海一帶活動；第六、七隊二十九人幾經周折，到達北

江的翁源，加入第十二集團軍政治大隊工作；第八、九、十、十一隊共六十六人，到北江始興縣東湖坪，參加第十二集團軍的政治工作。服務團的成員全是熱血青年，又有一定文化水平，這是他們的特點和優點。因此服務團成員在軍隊和群眾中充份發揮了他們的長處，大力開展宣傳鼓動工作，取得了卓越成績。正如服務團團長廖錦濤1940年春總結時所說：“在宣傳工作方面，我們採取歌咏、戲劇、漫畫、民衆夜校、民衆講座、兒童短期教育班、婦女識字班、青年訓練班、家庭訪問、田間訪問、民衆晚會、說書、唱木魚、音樂表演、街頭戲劇、化妝遊行、紀念會、聯歡會、軍民聯歡會等工作形式去宣傳，用民衆喜愛的形式與內容。三十個月來工作中，我們提高民衆的抗戰情緒，使他們明瞭抗戰與他們生活的關係，把高明、鶴山、新會、開平、東莞、寶安的民衆和淪陷了的中山、順德的民衆都激動起來了，做了動員民衆的基礎。”⁽²⁾服務團的工作並不局限於抗日政治宣傳活動，而是參加了全面的抗日鬥爭。他們在各個戰地組織擔架，救護傷

員，慰勞抗日軍隊；發動民衆，毀壞前綫各縣所有鐵路、公路、橋樑，使日軍的機械化部隊和騎兵在進攻中遭遇許多困難；建立軍民合作站，舉辦保甲長培訓班，組織戰時嚮導隊、運輸隊、擔架隊、破路隊；設軍隊過境接待站，利用墟日舉辦宣傳抗日大會。許多服務隊員還直接上火綫參加戰鬥。1938年12月，日軍在高明三洲海口村登陸，服務團第一隊帶領民衆到海口協助自衛團進行反擊，取得了勝利。

1939年8月，日軍進佔深圳。服務團第三隊在東莞、寶安一帶與遊擊隊共同對日軍作戰。10月3日，日軍三千餘人進攻觀瀾。我軍在觀瀾天堂圍進行狙擊。為了截斷日軍從南頭增援的計劃，需要炸燬觀瀾附近大沙河椅子十餘丈長的大木橋。隊員梁捷挺身而出，勇敢承擔了這項艱巨任務。他率領四名政工隊員和八名扛火藥的鄉民以及擔任火力掩護的一連士兵，悄悄摸近大橋約三十米附近，被守橋日軍發現，雙方猛烈交火。梁捷身先士卒，沉着指揮部隊抵抗，擊斃敵人數名，他本人也擊斃兩名日軍，但不幸身中數彈，與另外兩名隊員同時英勇犧牲。

梁捷是中山縣斗門乾霧人，家境貧苦，在澳門當過工人和店員。抗戰軍興，他報國心切，三次報名參加服務團，終獲批准。梁捷告別母親和妻兒，返回內地後，勤奮學習，積極工作，被提拔為組長，在觀瀾地區抗日獨當一面。他為國捐軀時，年僅29歲。第四遊擊區司令王若周呈報第四戰區司令長官，請予優恤。10月5日，四界救災會在中山灣仔舉行梁捷烈士追悼大會，附近各鄉抗先隊和學校師生代表共1,500餘人參加，氣氛肅穆悲壯。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服務團成員還有第八隊隊長黎景尹、第三隊隊長陳壽彭以及隊員陳曼、蘇達民等人，他們都為爭取這場偉大戰爭的勝利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回國服務團的抗日救亡工作成績卓越，受到當地人民和政府的普遍贊揚。1940年2月2日，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親自簽發證書，表彰服務團“到部服務以來，努力盡責，殊堪嘉許”。⁽³⁾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殘酷迫害抗日民主勢力。此後這股政治逆流也席捲華南戰區，第十二集團軍內部出現了白色恐怖。6月13日，廖錦濤到157師471團視察工作，突然被集團軍總司令部密令逮捕，次日解往曲江，囚禁在總司令部的憲兵連裡，遭到秘密審訊，強加以所謂“企圖顛覆政府”的莫須有罪名。廖錦濤受審時，大義凜然，慷慨陳辭，駁斥了軍法官的卑鄙誣衊。一個星期後，廖錦濤被迫害致死，犧牲時祇有27歲。

廖錦濤是廣東南海人，曾在澳門岐關公司任職員，1937年加入中共，四界救災會理事會成立後，當選為理事，負責宣傳工作，後擔任回國服務團團長。他以滿腔熱忱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奔走於港澳和內地之間，籌募經費、藥物和戰地需用物品，乃至印刷機等物；組織和率領了一批批服務團員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為支持祖國抗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澳門同胞的愛國志士。噩耗傳出後，在第12集團軍工作的服務團員極其憤慨，港澳愛國同胞也感到十分震驚和悲痛。10月間，四界救災會致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就廖錦濤被害事件提出質詢，指出廖錦濤率領服務團多批愛國青年回國參加抗戰，為國家民族作出貢獻，為何竟對這樣的愛國青年加以逮捕和殘害？第七戰區當局理虧心虛，不敢作答。

1941年冬在澳門的敵偽勢力日益猖獗，政治局勢日益惡劣的情況下，四界救災會被迫停止活動。而在第12集團軍的服務團成員，也陸續藉口求學、結婚、探親、治病等名義陸續離去，轉移到北江、西江、東江等地區，繼續從事抗日救國活動。

抗日戰爭期間，也有從內地到澳門來從事抗日活動的，廖平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廖平子(1880-1943)原名士堅，後改名任堅，字蘋齋，別號哲翁，又號秋人，廣東順德縣勒流鎮三村人。出生於世代書香之家。祖父廖伯雪是個舉人，酷愛讀書，在兄弟分家的時候，不要田產，祇要書籍，被鄉人視為傻瓜，後成為晚清順德詩

人，有詩文行世。父親廖季延在家鄉開設雜貨店謀生，也是喜歡讀書的人。廖平子家有此富足的藏書，又十分好學，早年就讀於大良鳳山書院，品學兼優，深得師友愛重。他的家庭亦有崇尚習武的家風，因此平子自幼除了學文還喜習武藝，能持槍，能拳術。其時家鄉匪患甚烈，他曾與鄉勇一起荷槍禦匪；後來在日本留學時，一次與日人鬥毆，持棍將對手擊倒，所用棍法便是名為“十三點半”的家傳棍法。

清朝末年政治腐敗，國勢衰落，列強虎視眈眈，瓜分危機嚴重。廖平子滿懷對現實的憤懣不平，與同邑革命志士伍憲子、盧信等人經常著文抨擊時政，倡導革命，時人稱為“順德三傑”。1902年開始投稿香港《中國日報》，鼓吹民族主義，抨擊清朝暴政；1904年秋，應陳少白之聘，赴港任《中國日報》編輯，主持副刊〈鼓吹錄〉，同時加入興中會。1905年同盟會成立，廖當年即在香港與鄭貫公、盧信等人入盟；1907年冬赴日本留學。其間，參加了留學生組織的“抗戰義勇隊”，又與盧信等人在東京創辦《大江月報》；1909年回國，常為香港《中國時報》和廣州《平民日報》撰文。

與此同時，廖平子還積極參與反對沙俄在東北地區的侵略活動。1910年間廖平子應同盟會同志邀約，親赴東北吉林參加拒俄運動。他平素與香山同盟會的革命志士常有往來，此次均紛紛賦詩為其壯行。《香山旬報》刊載〈懷平子二首〉，作者署名諷一，是香山的同盟會員鄭道實之筆名。其序文稱：“平子年方強仕，不欲局促鄉里間，今春有西粵之行，不合而歸。逮秋復應吉林某君之招，襄贊新猷，平子終有合也。書此奉贈，聊當筆札爾。”

其一：

際遇風雲會有期，何曾嘆老與蹉卑。
幹時羞挾河汾策，憂國先傳杜老辭。

古調寧求多賞識，美人總不惜淹遲？
胸中自足分涇渭，豈微庸夫泣路歧。

其二：

邊地烽烟日數驚，誰從東海制長鯨。
礦權路軌傷魚爛，振翮衝霄看鳥鳴。

利器自應多難別，功名羞說待人成。
書來不作尋常語，猶是當年擊楫情。⁽⁴⁾

又《香山旬報》編輯譚士也寫了〈寄懷平子〉詩一首，其序文說：“平子客吉林，書來索寄近作，賦此用代魚雁，即希吟正。”其詩如下：

胸中五岳久魁奇，會向遐陬一證之。
痛哭人同賈太傅，罪言文頑杜少司。

天南政黨成孤鼠，宗國風雲尚陸離。
抱負知君猶勝昔，何當同話酒盈卮。⁽⁵⁾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廖平子追隨孫中山，被聘為民國臨時稽勳局審議員。1913年秋二次革命失敗後，棄職回鄉，不問政事。他曾主持上海精武體育會，成績卓著，在社會上影響巨大；1930年應聘赴南京出任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撰委員，至1932年，因主編易人，辭職返鄉從事農桑，欲在家鄉改良農桑養蠶，振興農業，餘暇吟詩繪畫，從事文學創作；著有長篇小說《尺素書》、《南宋亡國演義》，粵曲劇本《帝女花》，詩歌《從軍樂》等。廖平子性情高潔自愛，不與官場同流合污。

1938年10月21日，日寇侵陷廣州，附近各縣也相繼淪陷。在國破家亡的危險關頭，五十六歲的廖平子熱血沸騰，投筆從戎。廖平子傾其家產在家鄉召集民團，組織敢死隊，避實擊虛，神出鬼沒地與敵偽周旋，使敵人疲於奔命，可惜由於槍械差劣，彈藥不足，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家產也為之蕩然。廖平子於是於1938年11月22日携

眷亡命澳門，抵澳後，幾經周折，一家四口在筷子磯貧民區租屋居住，不久又受聘為板障堂學校國文教員。儘管身為難民，流寓異鄉，但“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聲言，“槍放下，筆可操也”，決心“以詩歌為抗戰工作”（《予心》序言），在特殊的環境裡，採取一種特殊的方式，繼續進行抗戰。

1939年，廖平子在澳門自辦一種半月刊的詩畫雜誌，以宣傳抗日。雜誌取名“淹留”，是借屈原《離騷》中的“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激發着廖平子。廖平子在《淹留·發起辭》中說：“淹留者何？志無成也，讀書無成，抗戰亦無成也。然則將若之何？吾將以一筆墨為原料，以詩歌為工作（具），身上百千萬億毛孔，一一放出無限光芒。以與敵作殊死戰，內則加筆伐於魑魅魍魎，表同情於志士仁人。於是，國魂指日以復，國難指日以蘇，個人人格亦永不會損失，以存天地正氣。”他雖喜歡詩歌，却反對無病呻吟、吟風弄月的無聊之作。廖平子說：“文人之有詩歌，文人之結晶也。然詩歌云者，豈特吟風弄月，欣奇賞勝，往復酬酢而已？必將察禍福之本原，挺然而作國家民族之保障。故夫武人之劍鋒，不能為國家民族効力，武人之羞也；文人之筆鋒，不能為國家民族捍衛，抑亦文人之耻也。”廖平子編輯的《淹留》是一本手抄刊物，他親力親為，所有撰稿、抄寫、裝訂，以及郵寄等一切事務，統統由他一人擔當。因人力所限，每期僅出版十五冊，每冊定價五角。當此國家與個人危難時刻，廖平子既為個人謀生存，以此勉強維持生活，家人還以糊火柴盒輔助家用。彼不忘積極宣傳抗日救國的革命精神，聞者莫不握腕驚嘆。當時蔡元培寓居香港，得知廖平子自辦一種抗日文藝雜誌，十分欽佩，每期都託人購買，甚至以數百元的重價購買一冊。這除了蔡元培慧眼獨到，對“深得宋元人筆意”的廖平子的畫視同拱璧之外，也是有意支持這位潦倒的愛國詩人解決經濟危機。



廖平子(1880-1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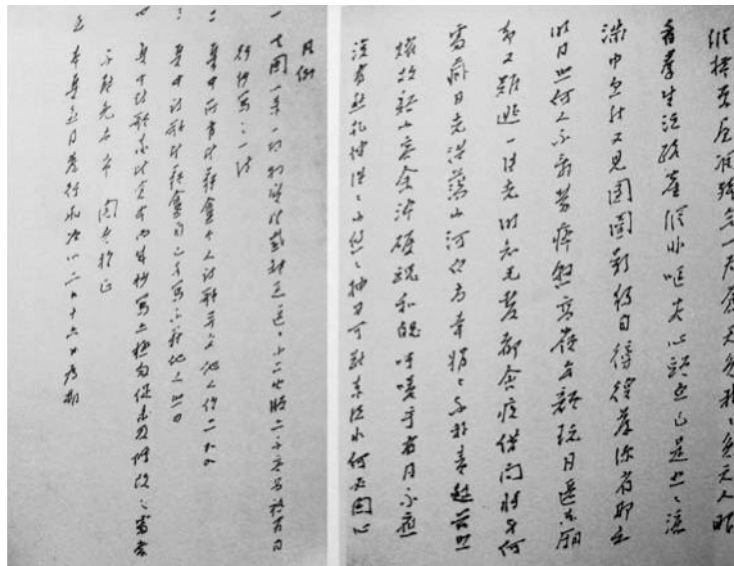
在《淹留》中，詩人憤怒聲討日寇的戰爭罪行，熱情謳歌廣大人民堅貞不屈、誓死保衛家鄉的英雄氣概。〈哀江頭〉一詩，敘述一個家園被毀、舉家抗敵的悲壯故事：“……誰知胡馬逼人來，鐵鳥轟轟日數回。初毀田園後毀室，灶下崩騰有劫灰。良人努力田間起，勢與倭奴搏一死。”

國難期間，澳門曾經為不少人提供了安身立命之處，廖平子是其中一位十分出色的文士。《淹留》在澳門出版，是澳門一份重要的文化財產，也是抗日戰爭期間，澳門人民共赴國難的最佳見證。《淹留》出至四十期，便改名“天風”，又續出至十四期而停刊。

1941年冬，日寇佔領香港，澳門人心惶惶。廖平子決計回鄉。從1938年至1942年，廖平子先後蟄居澳門五年，受盡葡萄牙殖民者的歧視與壓迫，十分憤懣。廖平子於1942年冬轉入內地



《淹留》封面



《淹留》之一頁

曲江，繼續從事抗日救國活動。他在曲江居留期間，又出版手抄詩畫雜誌，取名“予心”。《予心》半月刊，也是每期出十五冊，每冊十圓，一月可得三百圓。當時有一縣長是廖平子的朋友，以千元高價購買《予心》一冊。他在〈《予心》自序〉說：“草《淹留》四十期，《天風》十四期，皆以詩歌為抗戰工具。槍放下，筆可操也。”表示廖平子雖不能再率領敢死隊進行抗日，但運用筆杆子，也是可以進行抗日救國宣傳的。從《淹留》與《天風》到《予心》的出版，整份雜誌沒有一個字是印刷的，全部是清一色的手寫本，從編輯、手寫到裝訂、發行郵寄，均出一人之手完成，這在世界報刊史上可謂空前絕後。廖平子當時年僅八歲的兒子廖鼎，也在身邊幫忙做些打雜工作。每期祇出版十五份，這也是世界上發行量最少的一份雜誌。隨着現代印刷術日新月異，今後再也沒有人出版手寫雜誌了，從這一點來說，真可謂“絕後”也！1943年4月，他給馮自由寫了一封信，表示願意以鬻畫所得，購買滑翔機一架，以供抗日之用。當時一架滑翔機約值一萬圓，廖平子已賣得書畫約四千圓，盡獻為抗日經費，當時在報界傳為新聞。廖平子又把此款轉為獻機之用。遺憾的是《予心》出至

第五期，廖平子便病逝了，時為1943年9月，享年六十三歲。⁽⁶⁾

抗日戰爭期間，澳葡政府標榜“中立”，對澳門同胞抗日救亡的愛國活動，採取不支持 and 遏制政策。雖然如此，仍有一些有正義感的澳門葡人聲援中國偉大的抗日鬥爭，白樂嘉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 1897-1988)，澳門土生葡人後代，其家族世居澳門。鴉片戰爭後，澳門港口衰落，他的曾祖父前往香港發展。白樂嘉生於香港，畢業於聖若瑟學院，後任教於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擔任英語和英國文學教席。從1920年開始研究澳門歷史，撰寫有關論著達六十多種。其中《西方開拓者及其發現澳門》(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u)一書，是最具有史學價值的代表作。該書含有豐富的外國教會和政府機構的葡語文獻資料，在全面闡述葡萄牙海外擴張的背景之後，着重探討了葡人入居澳門問題，對澳門史研究具有一定參考價值。抗戰期間，白樂嘉曾在國民黨調查統計局澳門室參加工作，卓有成績。因此，抗戰結束以後，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澳門室於1946年1月給白樂嘉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澳門土生葡人學者白樂嘉



國民政府發給白樂嘉的獎狀

澳門的抗日救亡運動之所以能够轟轟烈烈地開展，並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同澳門的進步青年和愛國者之積極參與有莫大關係。大革命時期中共開始在澳門建立組織，名稱“中共澳門特別支部”，由廣東省委領導，成員曾發展到數十人；但大革命失敗後，其工作一度陷於停頓，之後走過一段曲折的道路。

在較長一段時間，中共澳門黨組織的工作重心是工人運動，發動工人反對資本家，但由於不符合澳門實際情況，遇到了很大阻力。1929年11月澳門特支給省委的一份報告，就反映了這種情況：“澳門的環境，大有差別，澳門尺寸之地且交通又不方便，若做偉大的鬥爭，當然沒有可能，（……）以去年陳聯馨香舖要求加工是一個舉例，因東主減工錢而至罷工，當時澳政府派差拿人，卒至無條件而屈服。”（據〈中共澳門特支給省委的報告〉，1929年11月15日。）這段時間，

中共在澳門的工作損失很大。直到中共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策略之後，中共在澳門的工作才開始復蘇，到1936年以後，澳門發展了一批黨員，並恢復了一些黨員的組織關係。⁽⁷⁾ 1938年中共澳門特支書記杜嵐，女，二十多歲，小學教師。

1938年10月21日，日軍佔領廣州。24日，廣東省委決定，在香港成立東南特委，澳門市工委的工作劃歸東南特委負責，由廖錦濤任工委書記。廖為汽車公司職員，三十來歲，1937年入黨；組織部長余化，澳門人，二十多歲，中學文化，小學教師，1938年入黨，因工作出色，1939年調任東南特委青年部長；宣傳部長林楓。廖錦濤任書記時，澳門黨組織的“工作有了相當的發展，到廣州失守時有黨員五十人”。1939年初，廖錦濤領導服務團回內地，余化任書記，組織部長鄧平，宣傳部長林楓。1939年4月，余化調到特委，



一幅素描：抗戰期間避亂澳門的學生露營郊外

林楓任書記。1939年7月，林楓調廣遊二支隊（吳勤部隊），鄭任生出任書記。鄭內戰時期入黨，1937年恢復黨的關係，大學文化程度，中山人，曾任中山縣委宣傳部長，在澳門的職業為教師。“目前看他工作還積極，還能夠根據我們的原則做工作，澳門的工作目前比幾個月前進步的。”⁽⁸⁾

1939年11月，東南特委被撤銷，澳門工委由廣東省委直接領導。當時黨員發展到四十六人，其中產業工人二十五人，教員十二人，學生六人，商人兩人，自由職業者一人。工委由三人組成，除書記鄭任生外，組織部長鄧平，織布廠女工，20多歲，“積極負責，階級意識及組織觀念還好，有小學文化水平”，“宣傳部長沈△△同志是個新黨員，小學教員”。下設八個支部，八名支部書記都是抗戰後入黨的黨員。⁽⁹⁾

1940年6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廣東省委分為粵北省委和粵南省委，澳門工作由粵南省委負責。關於澳門情況，尹林平1943年2月給中央的

電報說：“廣州、澳門、廣州灣（今湛江市——引者）三城市之具體情況，因交通困難，尚未清楚。現正派人聯絡，詳情以後報告（照去年7月前的組織基礎，廣州祇有二十五人，澳門二十八人，廣州灣有九個人）。”也即1942年7月以前為二十八人。為適應形勢的變化，臨時工委還對廣州、香港、澳門、廣州灣四城市的黨組織工作原則作了如下規定：

一、省、港、澳、灣四個城市黨組織依照中央指示由梁廣負責指導，在各城市分設特派員一人，採取單綫領導方式，必要地區設平行組織（分別職業部門及工廠、學校，分開地區）。

二、省、港、澳、灣均處於敵後及被敵人統治情況下，黨的組織應堅決執行中央指示，長期掩護、積蓄力量、培養幹部、埋頭苦幹的方針。

三、領導幹部職業化，停止會議生活，停發文件，關係疏遠，禁止任何橫的關係。港、澳、灣着重鞏固，慎重發展（主要工人、海員、學生）。

廣州則着重發展（主要工、學兩類），亦採取雙重組織，嚴格審查工作。

四、以勤職、勤學、勤交友的精神去團結各階層人士，開展廣泛統戰工作，加強幹部與黨員教育，培養獨立工作的能力。1944年10月，隨着環境的好轉，省臨委向中央請示在大部分地區恢復組織活動，但在“國民黨統治區及澳門仍堅持原來方針，祇加強聯繫及階級教育”。

1947年改設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香港分局下設城市工作委員會，繼續指導着中共黨組織在澳門的工作，“城委，下分香港市委、廣州市委、澳門市委、湛江市委、桂林工委，有黨員約一千五百名”，其中香港、廣州即佔一千二百名。至於澳門的黨員人數及工作狀況，香港分局1948年9月的一份電報說：“澳門則有黨員十九人，中有黑名單的十人，無的九人，前者不敢活動，後者則領導弱，作風保守。黨員分散，聯繫不密。（……）我們澳門之方針為：深入群眾，發展新生力量；首先從改造領導、教育舊基礎做起，糾正保守作風，展開群工，才能挽救‘從少到無’的危險。”在這一方針指導下，黨在澳門的工作得到及時調整和充實，為支援人民解放戰爭，發揮了應有作用。到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共再次從港澳抽調幹部參與華南各地接管，包括柯麟也調回中山醫學院任黨委書記兼院長，中共在澳門的工作又交給了一批新的同志。

澳門是連接廣東與海外的門戶，地理位置特殊，而且處於國民黨政權的直接統治之外，抗戰時期保持着形式上的中立，鬥爭環境與內地略有不同。但另一方面，澳門地域狹小，才十幾平方公里，活動空間十分有限，二三十年代人口僅十餘萬，到抗戰時期因難民湧入才增到三十幾萬，外來人員容易引起注意，若沒有正當職業作掩護，要長期活動是十分困難的。基於上述特殊條件，民主革命時期，中共在澳門的活動，大體上有這樣一些內容：

1) 掩護革命同志，提供撤退和轉移的便利。1927年廣州起義之後，中共又準備在江門發

動起義，但不慎被國民黨破獲，“負責同志都逃來香港和澳門了”。澳門也曾是葉挺的避難所，南昌起義失敗後，葉挺在澳門隱蔽了一個多月，然後從澳門回廣州參加了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他又到澳門隱蔽起來，半年之後，又從這裡去蘇聯和歐洲。1941年底，香港淪陷，一大批來不及從香港撤退的幹部和進步文化人士取道澳門轉移，他們以香港大中華酒店為據點集中，然後由組織安排乘走私船，經長洲島過伶仃洋到澳門，由中共在澳門的秘密聯絡站幫助，經廣州灣或江門、臺山到桂林。這批人包括夏衍、范長江、廖夢醒、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金仲華、王瑩等幾十人。據廖夢醒回憶：“到澳門以後，我們立即與柯麟同志的地下交通站取得了聯繫。”廖的丈夫李少石是南方局派到香港負責地下工作的，撤離香港後又“留澳門堅持地下工作一年多”⁽¹⁰⁾。

2) 動員人力物力，支援內地鬥爭。十年內戰時期，中共澳門支部曾動員人員到內地和紅軍中去工作，1931年4月團廣東省委的工作報告提到，“在澳門動員了兩個南洋失業回來的到紅軍中去”。

抗戰爆發之後，中共澳門工委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廣泛發動澳門同胞，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先後動員和組織了一批愛國青年加入“惠陽青年回鄉服務團”、“會寧華僑回鄉服務團”和“旅澳青年鄉村工作團”，回到廣東的東江、西江和粵中等地參加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8月成立的澳門四界（教育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就是在中共澳門黨組織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中共澳門工委還動員愛國青年回內地參加抗戰，1938年10月21日，“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正式成立，由黨的負責人、救災會理事廖錦濤任團長，先後派出十一個隊共一百六十多名男女青年返回內地工作。為加強黨的領導，服務團於1939年4月成立中共動員青年回鄉服務支部，書記胡澤群，組織委員沈章平，宣傳委員梁鐵。服務團以下各隊也秘密建立了中共支部或黨小組。



澳門愛國者的抗日宣傳畫

1941年1月，粵東南特委組織委員吳有恒給中央的報告也提到特委“從香港、澳門動員了大批的幹部、黨員，特別是堅定的工人幹部和黨員回敵後工作，增加了內地的力量與內地的同志們的信心”（〈吳有恒關於粵東南特委工作給中央的報告〉，1941年1月13日）。這時澳門回內地的黨員已有二十餘人。1944年春，中共中山義勇大隊派鄭秀、郭寧等化裝成普通百姓，進入澳門活動，建立了秘密辦事處，動員了不少澳門青年到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據地工作。這些青年先是在代號為“紐約橋”的“青年訓練班”學習，然後分配到宣傳隊、醫療站或者到連隊做文化教員、政治戰士、衛生員等，在部隊當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種訓練班一共辦了三期。⁽¹¹⁾

香港淪陷後，澳門處境日益孤立。日偽和海盜、土匪等反動勢力乘虛而入，社會治安混亂。澳葡當局對此無可奈何，從自身利益出發，亟盼得到中山抗日武裝的援助，以對付這些反動勢力。而根據地方面也想利用澳門中立區的特殊環境，開展統戰工作，建立合作關係，以便於動員和團結澳門同胞參加抗日，從軍需給養、醫療衛生、交通聯絡方面支援抗戰。於是1944年8月間，中山義勇大隊長歐初通過在五桂山區傳教的葡籍安神父，與澳葡當局的代表進行商談，達成合作協議：1)澳門當局同意義勇大隊派出人員到澳門活動，但不要太公開；2)澳門當局與義勇大隊互相配合，打擊擾亂澳門之反動分子和土匪，維持澳門的治安；3)澳門當局同意義勇大隊將重傷員送澳門醫院治療；同意在澳門募捐、購買子彈、醫療器械及電臺等通訊器材。其後，雙方根據協議開展合作，義勇大隊獲得捐款中儲券五十五萬圓和一批藥品。義勇大隊也協助抓獲挺進第三縱隊派到澳門搶劫勒索綽號“老鼠精”的兵痞，對澳門社會治安的改善起到一定作用。⁽¹²⁾

【註】

- (1) 《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星光書店 1990年版，頁21。
- (2) 《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星光書店 1990年版，頁25。
- (3) 《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星光書店 1990年版，頁32後面的該證書影印件。
- (4) 《香山旬報》第81期，庚戌十一月二十一日，頁13-14，文苑。
- (5) 《香山旬報》第82期，庚戌十二月初一日，頁14，文苑。
- (6)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頁250-252。
- (7) 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中國共產黨廣東省組織史資料》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頁139。
- (8) 〈吳有恒關於粵東南特委工作給中央的報告〉，1941年1月13日。
- (9) 〈粵東南特委地方黨幹部黨員統計表〉，統計時間：1939年11月。
- (10) 《秘密大營救》，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頁360。
- (11) 歐初：〈孫中山故鄉抗日鬥爭二三事〉，《炎黃春秋》1995年第11期。
- (12) 杜先烈等編：《珠江縱隊史》，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0年10月出版，頁212-214。